

复旦 外国语言文学 论丛

Fudan Forum

复 旦 大 学 外 文 学 院

春季号

Spring, 2008

on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复旦外国语言文学论丛

(2008 年春季号)

复旦大学外文学院

復旦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复旦外国语言文学论丛. 08 春季号 / 复旦大学外文学院
编.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 9
ISBN 978-7-309-04549-9

I. 复… II. 复… III. ①语言学—外国—文集②文学研
究—外国—文集 IV. H0—53 I1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48011 号

复旦外国语言文学论丛. 08 春季号

复旦大学外文学院 编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86-21-65642857(门市零售)
86-21-65100562(团体订购) 86-21-65109143(外埠邮购)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责任编辑 庄彩云

出品人 贺圣遂

印	刷	句容市排印厂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1.5
字	数	279 千
版	次	2008 年 9 月第二版第二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309 - 04549 - 9 / H · 889
定	价	2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编 委 会

主编:张 冲

本期执行主编:张 冲

编委(按姓氏汉语拼音
为序):

蔡基刚 何刚强

黄勇民 姜 宏

姜银国 陆谷孙

唐 敏 曲卫国

沈 黎 谈 峥

魏育青 熊学亮

张 冲 褚孝泉

朱永生

特约专稿

人文学科的全球化

——一项长期投资 詹姆斯·安格尔(3)

外国文学研究

人物描写艺术的历史性突破:论《达罗卫夫人》中人物

关系的构建 李维屏 杨理达(15)

叙事学发展的轨迹及其带来的思考 胡全生(20)

空间批评:美国族裔文学阐释的新视角

——美国华裔作家赵健秀短篇小说评析 徐颖果(33)

动词性上帝的萌生

——奥康纳的女性主义神学观 杨纪平(40)

道德批评视角下的马丁·艾米斯 张和龙(47)

伊迪丝·华顿作品中的多重语境

——女性主义及后殖民主义视角下的《夏天》... 李 晋(55)

俄、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流变之比较 李新梅(64)

幻战 惧战 写战

——评菲利普·卡普托的越战小说《战争的谣言》

..... 甘文平 胡 庆(74)

无名的悲剧 黄昌朝 何时瑜(82)

外国语言与语言教学研究

英语招呼语的历时语用研究 曲卫国(89)

语言学科间的互动推动语言学向前发展 郭 鸿(101)

英汉词义精确性及其对语境的依赖 蔡基刚(111)

德语动词结构剖析及教学法的简化 朱静舫(120)

从语法、功能和批判角度阅读日本《新历史教科书》

..... 顾 乡(131)

语料库语言学研究综述	何常丽(140)
------------------	----------

翻译与词典研究

词典的参见体系综论	万江波(147)
-----------------	----------

双语词典例证翻译与翻译教学

——兼评《英汉大词典》(第二版)	王 正 孙东云(154)
------------------------	--------------

开辟译史研究的多维视角:简评皮姆的翻译多元因果论

.....	姜 倩(161)
-------	----------

口译操作中的 AERP 研究	康志峰(169)
----------------------	----------

编委会公告	(177)
-------------	-------

复旦大学出版社外语精品教材及获奖图书一览	(178)
----------------------------	-------

特 约 专 稿

编者按语:2007年12月,美国哈佛大学英美文学系主任安格尔教授(James Engell)应邀访问复旦大学,并为外文学院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及全校师生做了系列学术讲座和题为“人文学科的全球化:一项长期投资”(Globalizing the Humanities: A Long-term Investment)的演讲。蒙安格尔教授惠寄讲稿并应允我们将其译成中文,刊登于本刊2008年春季号。我们在此向安格尔教授表示衷心感谢!

人文学科的全球化

——一项长期投资

詹姆斯·安格尔

(哈佛大学)

—

首先请允许我解释一下选择这个话题的原因。在全世界众多学府中,人文学科如今正处于边缘化的状态。很多人内心里都认为:人文学科不实用,仅供娱乐,且在某种程度上比自然科学、经济学或是国际关系学更为“简单”或“柔软”。这些想法都不正确,而我更担心的是,人文学科不符合我所谓的“三大标准”中的任何一条:

第一,保证将来能赚到钱;

第二,研究与钱有关的学科,换言之,就是商学、经济学或金融财政学;

第三,以获得拨款或研究经费的形式得到钱。

总的来说,在大学里,如果你选择读人文学科,就无法保证将来能赚大钱。我不清楚在中国具体情况是怎样,但是在美国的确如此。你不像经济、财政或是商业管理专业的人那样研究钱,而且最后你也得不到一大笔拨款经费。事实上,比起自然科学和技术类学科,你得到的微不足道。

这在美国过去的30年又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与那些至少符合“三大标准”其中一项的领域相比,人文学科在学位授予计划、系科数量和声望方面都没有提高。压力——尤其是经济压力——使我们忽视了一个事实:人文学科方面的教育对于任何文化都至关重要,而且对政治和经济都有重大影响。此类教育的好处之一是真正积累了为人处世方面的智慧。这并不单指增长了在诗歌、戏剧和小说方面的审美知识——虽然这一点很重要,而且被正确诠释的文学作品能使一个学生变得更加深刻,对人性、历史、语言和文化有更好的了解。如果在缺乏文化、历史、语言、宗教和艺术知识的情况下——一味行事,难免会引起全国性的社会问题,甚至是灾难。

这就是我深深忧虑的原因。

现在请允许我朗读几句拜伦的诗。开始时可能会显得有点奇怪。诗句不是完整的,是

在拜伦的长篇诗作《唐璜》手稿的背面发现的,下面就是拜伦所写的一小节诗:

(原文)

I would to heaven that I were so much clay,
As I am blood, bone, marrow, passion, feeling—
Because at least the past were pass'd away—
And for the future—(but I write this reeling,
Having got drunk exceedingly today,
So that I seem to stand upon the ceiling)
I say—the future is a serious matter—
And so—for God's sake — hock and soda water!

(译文)

我向上天乞求,但愿我浑身是厚重的黄泥
可现在的我只有骨骼血气,激荡着活力和情感,
因为至少,过去的皆已流逝
而将来——(但我下笔时地旋天转,
我今天酩酊大醉不省人事
就好像倒立在了天花板)
我说——未来可是件严肃的事情——
所以——天呐——快给我白酒和苏打水!

我来解释一下。当时拜伦已经大醉,但他仍在以一种幽默的方式思虑未来。所以他觉得他必须起床,继续思索。不过他急需治愈宿醉的良方,其中一种古老的传统做法是喝白酒加苏打水。在原诗中,“hock”是德语中“hockheimer”的英语简写方式。在这一节最后,他说,“噢,天呐,我头痛欲裂。我该怎么办?我必须喝些白葡萄酒和苏打水。”在短短几行中,你感受到庄严戏剧融合着谐趣喜剧,严谨掺杂着风趣,这是拜伦的一贯风格。

确实,拜伦心知肚明,他只是在用有趣的语调来表达罢了。未来是个严肃的话题。人文学科可能呈现出过时、落后的样子,因为它们研究的是人类环境过去如何,而不是它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它们的主题和历史研究都与过去有关,甚至描写将来的科幻小说都是以前写的。有一部分人,如精明的普林斯顿前校长卡罗·夏皮罗,认为人文学科非常注重他所说的“灌输”,灌输一套特定的道德主张。但是这一点在很多人文学者眼中就显得非常奇特,比如苏格拉底,他通常都是提出问题,而不是提出主张,塞缪尔·约翰逊或萨特也都如此。

人文学科为改革文化而保护文化,它们对过去充满敬意,但认识到社会和个人生活都在改变,过去的那些行为与此时此地及将来的行为相异。也就是说,人文学科确实一直都在向前展望,但同时又向后回顾。它们珍惜文化继承,却常常对其提出尖锐的批评,而且认为这两种举动并无任何矛盾。人类思想和交流通常既保留传统又合乎当下,唯一的选择就是要么忽视我们赖以生存的文化和历史,要么为了推进我们的生活而去了解文化和历史。人文学科往往面向未来。我认为,我们在外交政策上所犯的严重错误,比如说美国政府所犯的错误,是由于领导人对于他们想施加政治影响力的国家的文化、历史、语言、艺术和宗教一窍不通。实行广义上的、更人文化的教育,对任何地方的国际关系改善都有帮助,而不应该像过

去40年那样,一味强调强权政治或是地缘政治教育,虽然它们也很重要。

我想就“文化”一词谈些看法。在英语中,“文化”一词具有多层不同含义,每一层意思都与过去的定义有所区别。我们可以说洛杉矶的黑帮生活在“暴力文化”之中,我们可以谈论任何一个特定群体的文化,而其实只涉及他们日常生活的习惯模式而已,我们也可以把一个群体的人类学特征等同于其他文化。在以上这些情境中,我们都可以讲“文化”一词,但由于过度使用,我还是要提醒大家该词的原意。追溯到1805年,诗人威廉·华兹华斯最早提及此词,当时它还是从一个德语单词的部分转变而来,其意思是:“怀着进步和改良的目的而进行的一种对自我、对社会的情操陶冶。”此时此刻,你们会说:“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有所进步?我们从何得知社会在前进?”这问题很难回答。虽然难以表达,但它确实是我们的目标,是我们的想法。换言之,文化不是一系列没有判断力、没有价值支撑的行为,而是你想要实现的一种自省、学习、言行举止的概念,这些行动可以让生活更进步,不论是物质或精神生活,或两者皆有,同时也让社会变得更美好。

许多地方的氛围都传递出“人文学科无用”的信息。你们该怎么办?我的学生有时会过来找我,跟我说:“我父母让我不要学英国文学,他们说那根本没用。”一个经理人或工人解决特定的原料或财务问题,并完全遵循“效率”原则做出各种决定,对他们来说,人文学科就是昂贵的装饰,虽然实际上花费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人文学科似乎不具有直接有效性。另外,很难去衡量人文学科的功效,若要精确地加以测量更是难上加难。而且现在世界的普遍趋势是用钱和数字去衡量一切事物,无论是用金融曲线图、贸易图标,还是其他产品的度量方式,量化标准已经被视为发展的公制标准了。

我不想表现出一副反对的样子。事实上我不反对这种标准。我的观点是,量化的价值并不是唯一的价值,还有其他形式的重要价值。并不是所有能量化的东西都是有价值的,并不是所有有价值的东西都能被量化(爱因斯坦语)。任何应用于人类生活、满足人类需求的事物或技术信息都必须具备道德、精神和审美上的活力。1956年,约翰·肯尼迪说:“相较于诗人懂政治来说,政治家懂诗歌更为重要。”在探访一些商界、政界或科学界名流的故居时,我经常惊奇地发现,他们的家中堆满历史和文学书籍,其中很多人都密切关注本国和外国的文化传统。如果这种学习习惯渐渐消失,如果处理国际事务的专业人士不再注重深层的文化价值,不再关注判断、了解人类动机的方法——不仅是赋予乐趣的动机,还包括用实际行动传递真理、伸张正义的动机,那么我们将失去至宝,失掉一些弥足珍贵的东西。

肯尼迪还说:“讲到语言的有效使用,真可谓‘风格即人’”(他引用了一句法国谚语,就是说你写作的方式能反映你的个性),“当然文风也能表现一个国家的特点。个人、国家,甚至整个文明都可从文风来判断。”文风所展现的不是普通的效果,而是基于语言习惯性表达方式的明智判断,不是表面闪光或霓虹灯,而是应用于语言微妙使用、展现人类目标和动力的学习。

现如今在美国,在很多专业学院都实行道德教育。起先由医学道德引领这一风潮,商学院现在也有商业道德的监督机构,但它们都做得不够好。商学院道德教育的效果——可以从报纸的内容看出它是否有效。公司在聘请道德专家上的花费高得足以让诡辩家脸红。但是道德规范太复杂了,跟习俗、历史经历息息相关,因此不能单纯靠一堂关于市场经济、医学或商业的研讨会就能学会或教授。

道德操行需要人文学科奠定的基础。它要求流动性及对不明确的事物做出动态的探查、解释,而这些只有在进行文学研究或是更难的符号语言研究时才能实现。这并不意味着

每个人都得成为专家,但是至少说明这方面的专家跟那些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人一样有价值,一样很重要,一样有用。我希望你们能坚信这一点,所以当其他人说你们所做的工作过于自我沉醉时,请纠正他们、告诉他们:他们的想法是错误的。

1771年,托马斯·杰弗逊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谈到活泼而持久的家庭关系和责任,他写道:“对儿女或父母来说,《李尔王》比任何枯燥的道德说教书卷都更容易使他们印象深刻。”亚伯拉罕·林肯读过的莎士比亚剧本的数目可能不亚于任何这方面的专业人士,并且他还对它们进行过仔细研究。我想,这使他形成了深刻的政治洞察力,他最喜爱的剧本是莎士比亚所有剧本中最阴郁的——《麦克白》。林肯对莎士比亚的理解使他增进了对现实世界中的事件的理解。他可以一口气背诵几个小时诗歌,有时他也自己写诗。我认为,他如果没有在诗歌方面的兴趣,就不可能那么深入了解人性并对之充满同情,而正是人性,使他带领国家度过了艰难的内战时期并帮助它疗伤。

人文主义本身不能保证社会不被败坏,但若无视它或降低它的水准,这个社会定会腐化堕落。

在这里,我还要提到另一位当代作家奥斯卡·卡勒(Oscar Callé),他的话十分中肯。他从南美来到美利坚,定居在得克萨斯州的休斯敦,但他是在哥伦比亚的麦德林城(Medellin)长大的。我不知道你们是否了解这个城市,那是我女儿的出生地(我妻子和我收养了她)。麦德林是哥伦比亚几大毒品集团中心之一。奥斯卡·卡勒说,几十年前他在那儿的时候,处于青春期的他阅读了不少托尔斯泰、普鲁斯特、乔伊斯和萨特的作品,他说,这些作家教给了他人性的深度、记忆、欲望、艰难的抉择、美和无私的精神。他们没有给出简单的答案。今天,麦德林比以前富裕多了。毒品进入了社区,带来大量利润,但是书不见了,犯罪率上升了。

几年前以赛亚·柏尔林(Isaiah Berlin)在接受国际道德奖时说,他阅读托尔斯泰、维柯和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这些作品帮助他成长。卓越的美国作家,如罗伯特·潘恩·沃伦(Robert Penn Warren)和阿奇波德·麦克利什(Archibald MacLeish),他们对政府、历史和文学都有很深的洞察。如果你想很好地了解美国政治,你可以去研究大量的美国政治学著作,但你也可以选择去读一本精彩的小说《国王的人马》(*All the King's Men*),是根据一个叫朗(Huey Long)的美国国会参议员的经验写成的。这部300页的小说也许比任何同样长度的政治学作品更能让你洞悉美国政治。

我年轻时曾有幸和阿奇波德·麦克利什交谈,他说他担心美国社会中热衷政府和公共事务的人与热爱文化和人文主义的人之间的隔阂会越来越大,他认为这种分歧的扩大对双方都有害处。他在刚开始职业生涯时是个律师,30岁前一直在波士顿一家著名的律师事务所工作,之后他辞了职,成为侨居巴黎的众多流亡者中的一员。他见了格特鲁德·斯泰因(Gertrude Stein)。他在巴黎学习,回美国时已是一位诗人,并获得了美国诗歌界最高奖——普利策奖。他根据《圣经》中的《约伯记》创作了一出严肃的百老汇剧《J. B.》,后来还担任过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副国务卿。他是律师、外交官、诗人及教师,每一种角色都扮演得很好。他曾担任哈佛大学修辞与演讲术博伊尔斯顿讲座教授,让他忧虑的是:兼具多种能力的人——他本人就是一例——将越来越罕见,因为人们会认为,一生只该从事一项专门的行业,除此之外其他事与你无关。但这样一来各个专门领域之间就很难进行对话——事实上,对话如此之难,于是人们都不去做此尝试了。他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二

这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人文学科本身的特点所导致的。下面我来解释一下原因：我认为人文学科是带着偏执走向专业化的，这就是说，就我熟悉的大学中的人文科学研究而言，研究者们把全部精力集中在很专业的问题上，他们的文章往往只能引起很小一部分其他领域专家的注意。这种现象本身并不坏，因为它的确能增长知识、加深理解。但若人文科学也像自然科学那样提高专业化程度，细化分支，专家们将不能从更宽广的视角一览他们所做的研究，也将不能与非专业人士进行交流。作为一名人文科学研究者，有一点我认为很重要：你至少要不时地开放自己的措词和写作，让不是专家的人也能看懂，让不如你勤奋的人们仍可以从你那里有所得并能与你对话。

在西方传统中，自普鲁塔克(Plutarch)的《希腊罗马名人传》问世以来，甚至在此书之前，人文主义就为道德生活做出了贡献，而且也是其主要支撑。事实上，我坚持认为：文学作品中有最复杂也最能使人获益的道德伦理个案。在丰富性上，在对道德抉择困难性的认识上，文学都冲击着我们的先入之见。诗人约翰·德莱顿说：“文学最好不要提供明确的教诲，但诗歌必须合乎道德。”尽管这听起来似乎自相矛盾，但我并不觉得这样——他的意思是，我们不愿意让文学成为必须被铭记和遵守的一系列法则，但文学最终必须体现道德生活的困境并对其作出探索。

奥斯卡·王尔德说，道德说教是一种不可原谅的矫揉造作的文风(意即：作家不该尝试在作品中给予读者任何教诲——那是糟糕的文风和表现形式)。他对社会怂恿我们追求一致性表示抗议，可他在自己的一句不常被引用的话中坚决主张：道德生活一直是艺术家主题的一部分。王尔德能出此言，我们不免有几分诧异，可他的的确确这么说过。换句话讲，他不是意在倡导某一具体的道德教喻，而是说艺术家在创作中会不可避免地涉及人们做道德选择的方式。艺术家必须面对这个现实，否则他就不是真正严肃的艺术家。

教授人文学科可以使伦理教育变得饶有生趣，这不是指灌输“真理”或文化标准，也不是指要去维持那些永远不可受质疑的东西，而是指检验和形成价值观——其中有些价值观也许会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但文学不应以这种方式来教，至少就我的经验来看是如此。热忱的诗人和作家们，不管是南非的阿索尔·富加德(Athol Fugard)、苏联的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xander Solzhenitsyn)，还是美国的普利摩·李维(Primo Levi)、安妮·弗兰克(Anne Frank)、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或是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他们都坚信：文学若不具伦理性，便一无是处。显然，文学与自由的纽带是表达的自由，最终，文学的作用丝毫不亚于人类精神的作用。

文学的用处在于培养提问的能力，驱使人们寻找《安娜·卡列尼娜》中列文称之为“谜”的问题的答案——去追问为什么？怎么办？

先前我提到了约翰·肯尼迪，现在我想引用他当总统时说过的一些话。他被邀请去参加自己最喜欢的一位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的颁奖典礼，他这么评价罗伯特·弗罗斯特：“他对人类悲剧性的体悟使他能够抵抗自我欺骗和肤浅的心满意足。弗罗斯特写道，‘我一直是一个熟稔黑暗的人’。由于他对深夜和正午有同样深刻的了解，由于他对人类心灵的苦难和对人类的成就有同样深刻的了解，他赋予了他所在的时代以战胜绝望的力量。”

他在内心深处对人类精神有着坚定的信心,他工整的诗句中蕴含着力量。这并非偶然,因为他将诗歌本身看成一种拯救方式,当权力导致傲慢时,诗歌提醒人们其自身的局限;当权力使人们变得目光短浅时,诗歌提醒他们人类经历的丰富多样性……蔑视艺术职责的国家将会迎来罗伯特·弗罗斯特《雇工之死》一诗中雇工的灾难:既无可‘傲然回顾’,亦无可‘欣然憧憬’。”换言之,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如果忘记了自己丰饶的文化遗产,将会退化为一派荒原。最后,肯尼迪说:“我希望看到在将来的美国,艺术成就能够得到与商业和政治成就同样程度的肯定和奖励。”

这种情况只是偶有发生,但这是肯尼迪的希望。事实上,他也在尽自己的力量去使之实现。他去世后,他的一些朋友一起为华盛顿表演艺术中心筹钱使之得以竣工,现在它被称为肯尼迪中心,由于肯尼迪对此项工程的关注,这个建筑就以他的名字命名。它不是办公楼或纪念馆,而是一个文学、音乐、舞蹈和戏剧的中心。

当然,与包括科学技术在内的一切有价值的知识一样,文学的作用只是潜在的,阅读文学作品或成为一名优秀的文学研究者并不能给你带来什么确定的东西。人文学科的知识就像解剖刀或是激光,它可以治疗充满仇恨的伤痕并使之愈合;但它也有可能被不正当地利用,为杀人辩护。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德国纳粹军官们爱好高雅音乐,他们谈论着最优秀的剧本。在19世纪的美国,奴隶主们对《圣经》每一部分都了如指掌,并能够将之倒背如流,可他们都把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混为一谈。

文学之用就是自由意志之用。这一关系解释了一些批评家返求形式方法的原因,如果不能对棘手的问题给出确定的答案,就很难成为师长或权威。但伟大的作家们更明事理,他们并不总是给出答案。他们发问,之后去探索。他们常常是第一个提出问题的人,可即便他们给出了现成的答案,他们的作品却在告诫我们,答案并不可信。

几乎无一例外的是,伟大的文学作品不会给出明确的道德法则——因为我们很快就会对其感到厌倦。我们不喜欢读这样的关于坏孩子的故事:“该这么做;该那么做,做个乖孩子,”诸如此类——不,这不是故事的原意所在。柯勒律治的佳作《古舟子咏》也以道德教育结尾,就是说我们要爱护所有生物,不论它们是伟大还是渺小。晚年时,柯勒律治告诉朋友说,其实那并非如此简单。他说得很对。那几行诗句被刻在金属板上,成为柯勒律治的纪念物。我想,现在他可能会感到有点不安,因为这样的概括对一首具有深刻的心理和想象内容的诗歌而言,显得过于简单了。

马里奥·法加斯·罗莎曾说过,阅读文学作品以前是、并将继续成为表达人类经历的主要方式,通过这种方式,人们无论其职业、无论其地理和文化地域、无论其寿命有多长或个体环境如何,彼此都能交流,并在世界上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一个没有阅读的世界将是不自由的、没有趣味的。

据报道,美国6岁到13岁的儿童平均每天看电视的时间是2.5个小时,而大部分电视内容——恕我直言——都是糟粕,这些儿童平均每天只有7分钟的时间花在阅读上。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因为趋势很明显。现在问题是,我们在电视面前能不能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呢?是的,如果你在做有意义的事情和思考的话,你就不能够束手无策地坐在一边。

由此看来,人文学科中的一些改革是值得思考的。如果我们开始教授修辞学和散文,那么人类会变得更加有效率,并可以更自如地运用其技能,这对于生活在世上的任何人而言都是大有裨益的。但我们并没有很好地教授这些知识。如何运用语言来表达真实的状况和问

题,如何引导他人给予例证,如何使辩论在逻辑上具有说服力,如何用那些技巧来分析和理解其他人用以说服你的言论?语言是定义所有不可量化的规律的工具。要教授作文,就要求有一流的范文,而这些范文大部分都不是近代作品。

在美国,写作被简单地当作流水账式的记录。“我做了这件事。我喜欢这个。我不喜欢那个。我认为这样。我相信那样。”这是极端荒谬的。偶尔写写这样的文章还可以,但用这种方式来学习写作是不可取的。除此之外,在美国,写作老师的薪水非常低,大概是因为所有人都认为教授写作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那些认为所有人都能教授写作的人显然从来没有真正教过写作。让他们来试试看吧。

在教授修辞的时候,应当教给学生一种在西方传统中称之为道德哲学或者职业道德的东西。同时教授修辞学和道德并非灌输,让学生和教育者们探讨道德问题,这么做既合理又有用,但硬性规定其结果则只能适得其反。毋庸赘言,在全球化世界里,人们应当掌握至少一门外语。过去几年中,我在政府和经济界工作的同僚们突然提倡说:“我们的学生至少要学会另一门语言!因为现在的市场全球化,他们需要学学中文。”这真让人觉得十分奇怪。我要说:“是的,没错,但我们这些教授语言和文学的人已经苦口婆心地劝说了几十年,希望学生可以学一门外语。这不仅是因为市场,也是为了促进人类彼此之间的理解,以及相关的文化和历史的因素。”

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是20世纪早期的哲学家,同时也是一位非常伟大的数学家,他和伯特兰·罗素合著了《数学原理》一书,他评论说,学术研究的危险在于死板的知识,所谓死板是指像化学中的惰性元素一样毫无生气。所以我们从过去寻找有关联的因素,找出为什么有些文本和艺术经过那么长的时间仍然没有消亡、而有一些却已经不复存在的原因。我前几天在上海博物馆看到一些古代长卷画、书法和雕塑展品,想起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如果要把这些东西保存几百年甚至上千年,需要投入多少心思呢?究竟有多少人曾经在保存这些文物的过程中,做过保存及把它们传承给后人的工作呢?他们为什么会做这些事情?是因为这些文物非常有价值所以他们可以出售吗?不,不管从什么角度来看,他们并无意售出文物,他们保存这些物品是为了传给后代。很多人拒绝把收藏品出售给别人,因为他们担心,这样一来,这些物品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坏。谁是最后保存这些文物的人呢?为什么这么多代的传承人发现这些物品的价值一直存在着、而其视觉吸引力不会随时代的变迁而受到影响呢?相关性一直是人文的核心目标:它影响着现在的行为和做法,试着将过去与现在结合。

在教育、出版和行销领域,让我们来探讨特殊性如何使我们有一个更宽广的理解。如果我们试着离开自己的特殊性,那么学术就能够更进一步,能开始探讨如何做出决定、辩证思考、判断人类的动机及有效地运用知识证据,探讨批判美学和知识是如何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行为。

三

我想用几分钟的时间来探讨一下在过去20年中,至少在美国发生过的一些让人头痛的问题,但我想这些问题也存在于其他国家。这是历史研究。

在过去的20年,在我的国家中,学历史的学生人数急剧下降,历史被认为是没有现实价值的东西,几百页的历史书看上去似乎带人走进一个遥远的充满尘封日期和死去人物的世

界。但是,民众领导如果匮乏历史知识,那就意味着无法把握社会机构及其目标、可能性和缺点,意味着无法看清需要什么样的改革,或是否有改革的需要。

没有历史知识背景的商业领导会匮乏效率,因为他会重复失败的战略,产生对人类行为评估的战略性的错误。当有人赚取了财富并且希望能够造福于社会时,一个历史性的视角能够确保他的贡献是有持续价值的。科学界的领袖若缺乏历史觉悟,就只会鼓励简单的技术运用,而非长期和全民性的运用,缺乏历史觉悟的政治领导只会导致重大的错误和悲剧。

亨利·杜鲁门总统并不是一位大学毕业生,他曾指出:“一个阅读历史和好的文学作品的人从来不会失败。阅读好书的人,特别是读人物传记和历史的人,已经准备好成为某个领域的领导者了。”对于社会或任何一个人来说,仅仅依赖短期记忆是永远不会成长的,我认为这就是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题为《历史》的论文所说的意思,他认为,人类只能在他所创造的历史中被理解,换句话说,不了解一个人的过往历史,就不可能完全了解一个人。这个过程会花费很多的时间,但那个人一定是一本由所有历史事实组成的百科全书。

这个观点并非仅要我们从历史中去获得教训,但我试着用自己的理解来解释爱默生的话,会觉得有的时候他的话非常尖锐,且难以理解。我认为,爱默生认为过去并非存在于书本、图画、博物馆或考古学的遗址中,过去并不存在于纽约或上海的艺术博物馆中,也不存在于复旦大学、哈佛大学的图书馆中。那并不是过去之所在。过去存在于你的心灵和意识中,存在于你如何获得和运用知识的过程中。那些书本、图画、记录和电影作为收藏品并没有任何意义,它们的意义必须经过人们的分析,这些人对它们十分熟悉,用新的方法来使用它们,用新的方法将它们集成一体,并注意到它们之间此前无人注意到的关联。

现在让我来谈谈阅读。这听上去非常容易。我们小时候都学过如何阅读。有时候学生申请研究所时,也会在申请书中写道:“祖父教我如何阅读……”你知道他接下来要写什么。这都是真实的状况。但事实上,阅读是一种恼人的挣扎,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我知道很多人都做过翻译,你们知道翻译的过程有多么痛苦。那是对习惯用语的一种测试。德国作家歌德晚年80岁时与朋友埃克曼交谈,他说:“你知道,人们并不知道学习阅读是件需要多少时间和精力的事情。我用了80年来学,总觉得自己尚未很好地掌握它。”也就是说“我仍然在学习阅读的技巧。”

良好的阅读和写作并非基本技巧,它们是精细的、技术性的、更高层次的技巧。它们和测量化学物质及发现亚原子的移动规律一样困难。与好的写作一样,阅读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我无法在脑海中找出一个能在30岁前写出代表作的优秀散文作家,这是因为一开始就要写出好作品是很难的。但却有一些诗人在年轻的时候写出了自己的代表作,但那是另外一门艺术了。写散文需要把所有的细节都写好,可是所有细节部分的写作并无一定的规律可循,一句话可以用15种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如果你有15句不同的话,每一句话又有15种不同的表达方式,所有这些话又有不同的排列组合方式,那么选出最好的词语放在最恰当的位置将会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如果有人认为人文科学相对来说很简单,因为大部分人都能阅读和写作,那这本身就是一个谬误。有些读者比其他人为更精细认真,也有些会给这些精细读者以回报。

在美国,法学院说他们最好的学生并非来自政治学院或法律培训班,而来自数学学院、文学院、历史学院和古代语言研究学院。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必须分析符号和语言系统,并且把它们运用整理在逻辑和易于解释的范畴内。

我想再说一些与亚伯拉罕·林肯有关的事,说说在他身上表现出的那种个人与语言的角力,那种挣扎。他读书相当仔细。我刚才说过,他经常背诗,并且能引用托马斯·格雷、罗伯特·彭斯、威廉·莎士比亚、罗伯特·赫里克、菲茨-格林·哈勒克、乔纳森·特朗布尔和亚历山大·蒲柏的诗句,他也谈论读过的《鲁滨逊漂流历险记》和《天路历程》。林肯还研读过有关语法和辩论的书籍。由于老是在读书学习,朋友就说他懒(在美国,这样的人很典型),朋友的意思是林肯不出去干活,因此他很懒。“他老在那读啊、画啊、写啊、算啊,还写诗什么的。”有人告诉林肯律师行的合伙人说他读得太多,太勤奋,人都读憔悴了。这显然是真的,年轻的时候,林肯把注意力都放到学习上,忽视了自己的身体。他一直保持学习的习惯。有人问他如何才能通晓法律知识时,林肯回答得很简短:“我的方法既简单又繁琐,把书拿来,反复读,反复学习。”

四

我们所有人,不论是领导人还是教育者,都必须倡导科技,但追求和使用科技却不能解决所有复杂的问题。人有个不好的习惯,总以为只要有了想法,不管想法好不好,都要用物质的手段去实现。要解决当前社会存在的重要问题,如果说技术和市场的力量是万能的,那就大大地低估了这一根深蒂固的习惯对我们的影响。乔纳森·斯威夫特给人下定义的时候曾说过我们不是理性动物,我们只是能推理的动物。

让我们看看所面临的重大问题:环境、种族关系、个人自由和集体安全平衡、国家内部和国际贫富差距。解决这些问题不能光靠几个专家提出的技术手段来解决,如果可以的话那早就解决了。这些问题太复杂,只有认识到必须正视人的动机、历史和文化在其中的影响才能解决这些问题。

人文精神在西方国家废除奴隶贸易、开展人权运动及建立和推动现代研究型大学的发展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德国是创办具有原创性的研究型大学的典范,在那里,他们一开始并不是依据自然科学的类别划分院系或者授课,早在19世纪初,他们依照各类人文科学、特别是语言研究来划分院系或者授课。

人们在辩论的时候经常引用物理学家沃纳·海森伯格的不确定性原理,我们看看他自己是怎么说的。他说:“现代科学结出的知识之果大多数是完美的,知识果实中流出来的技术将知识应用于实现各种目标。”但是他又说,“这不能证明在实现这些目标的过程中所取得的进步是有价值的。衡量这些进步的价值尺度来源于当初设立这些目标时人们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同科学则毫不相干。”这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的话。

再引述另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史蒂文·温伯格的话。他是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在一篇发表于2001年的文章中他写道:“尽管科学使我们认识价值观如何形成,科学知识无疑会继续增加我们获得自己觉得有价值的东西的能力,科学却无法告诉我们该形成什么样的价值观。”科学对此无能为力。科学很伟大,能改善人的生活,但科学却不教也不探索人的价值。

这些伟大的科学家告诉我们,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坐在同一条船上,两者之间应该多交流。人文学科与自然和社会学科密不可分,应该综合三方面因素考虑知识应用问题。现代思想史不是学科分裂的历史,而是越来越多的学科相互借鉴、互相交叉的历史。语言学同数学交叉,数学同哲学交叉,化学同心理学交叉,心理学同生物学交叉,物理学同化学交叉,化

学同天文学交叉。经济学同历史学、数学交叉;人类学同文学批评交叉,等等。

我们最终将看到各个领域的知识互相影响。为了眼前的实际利益而忽视单纯追求各种知识,那就像不筑坝蓄水却指望滚滚春潮推动磨坊永久转动一样不切实际。

教育和实际问题总也脱不开干系,特别是在科技社会。科技社会的目标是创造更多财富,提高民众生活水平,这是好事,但是不经约束的竞争经济通常将物质发展作为教育的唯一动力,并要逐渐取代伦理道德。像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在其《新工业国》一书中所说,长此以往,教育和研究终将沦为工业体系的附属品,现在也可以说是科技体系的附属品。他说,这种体系企图越过学校管理层将教育改造到符合它的要求。我重复一遍:他的意思是,社会上普遍有这样一种驱动力,要让大学成为实现其他目的的工具,要把大学变成不仅仅是单纯追求知识的场所。加尔布雷斯指出,要是意识到工业和科技成果最终取决于教育者这一源头,那么,教育和研究未必会成为附属品。他的观点很有趣,换个说法就是,如果你拼命要达到眼前目标,是的,你会成功,但会因此不能实现很多长远目标。大学等教育机构最突出的特点是它们的一项特殊功能,这项功能并不仅仅帮助立刻解决某些问题,而且提供一个坚实的学识基础,等将来掌握各种知识时,能把它们综合起来,从而产生让人意想不到的效果。从长远角度来看,世界一流大学就应该具备这样的功能。

一百年前,没人着手发明电视机或电子晶体管,人们致力于了解电子和电磁波。换句话说,基础性研究即基本探索不会马上有成果,但是之后会带来巨大的、出人意料的好处,这些事难以预见。问题在于:我们对基础性研究有没有信心?如果有的话,那么我们或许得等到孙辈才能看到研究成果。但是,如果你说:“好吧,我们用大学来解决眼下的这个问题或者那个问题”,那么,这样产生的研究成果肯定小得多。正如加尔布雷斯所说:“大学是培养人类性格最好的地方。”

如今在社会上有这样一种观点,尤其在美国,认为成功只意味着一件事,只有一件事:挣大钱。可悲的是,每年新生做调查问卷时都说自己上大学的主要原因是为了将来钱挣得更多些。75%的新生是这么说的。三四十年前的大学生可不是这么想的。他们上大学的主要原因是体验生命,构思人生哲学,还有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有一点更引起我们的警惕:简单的金钱动力已经掩盖并取代了任何创造性科学发现的愿望,或者文艺创作的愿望。当金钱收入成为唯一目标,并且影响越来越大时,别的目标就将消失殆尽。我的意思是,把经济成功作为目标并不邪恶,这样的做法可以理解,但要使其同别的目标保持平衡、和谐的关系。如果其他目标都没了,我们剩下的就只有短期投资。

再回过头来看看爱默生是如何给成功下定义的。他说:“不管通过一个健康的小孩、一个花园或是一种恢复的社会秩序,只要有一个生命因你的存在而活得简单,你就是成功的。”认同这一点可以说是有人文精神的表现。这种人文精神与特殊潮流不同,它来自人的全面发展,因此要求不断强调人文学科和自然学科教育的重要性,也就是自由教育的重要性,并把这种教育作为目标。相应的人文基础并不源于狭隘的学术上的人文精神,不需要职业训练,忘记这点的往往是从事那些职业的人文主义者。人文学科采用的知识和判断事实上是公共财富,是社会大众都拥有的美德,人人都能接触得到,构成公共利益,如大卫·休谟所说:“我们都是人文精神的一部分。”

(原文:詹姆斯·安格尔;翻译:邬璟璟、袁伦、姜艳妍、徐晓林;校对:张冲)